

Lines of Flight in Theory



理论的逃逸

陈永国 著

解构的缘起与话语

互文性与历史叙事

德里达：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主义

德勒兹：游牧思想与解域化流动

詹姆逊：现代性与资本的现代叙事

文化翻译：语言的逃逸政治

斯皮瓦克：作为解殖策略的翻译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银行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理论的逃逸

陈永国
著

**Lines of
Flight in
The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论的逃逸 / 陈永国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301-14026-0

I. 理… II. 陈… III. 文学理论—西方国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269 号

书 名: 理论的逃逸

著作责任者: 陈永国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026-0/I · 20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0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Preface

汪民安

这本书，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我早已谙熟于心。它们在不同时期成文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也是受益至深的读者。不过，我答应写这个序言，不单纯是因为我从书中获得的这份教益，也不单纯是因为我们多年来的默契和友谊，还因为将我们卷在一起的共同工作——正是这项共同工作，使得我们总是一起思考，并且因为这种共同思考，冲淡了我们各自日常生活方面的乏味和单调；也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的工作，我们（以及另外一些朋友）并不承受理论思考本应承受的孤单。陈永国的成就，毫无疑问，我总是将它们看成是我的成就；反过来，我的一点进步，他也一定会视为是他的进步。至少，他的书，或者我的书的出版，在分享喜悦这点上，我们毫无差异。

这本书，跨越了批评理论的三个阶段：最开始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发端的结构主义阶段：这是 60 年代法国独创性思想的开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叙事学和各种各样的文本理论展开了眼花缭乱的试验。文学借助于语言学的模式得以认知，人们第一次将主体和历史逐出了批评的视野，并将文学驱逐到语言结构的牢笼中：文学研究的法则，在语言学的法则下展开。接下来的阶段，是两个不同的线索的汇聚。一个线索来自于结构主义的内部反叛，德里达、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发现了另外一个索绪尔，发现了一个强调差异性的索绪尔，他们依然将文学限制在语言学内，但是，这不是结构和系统的语言学，而是差异和嬉戏的语言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解构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文本开始自我内证，解构作为一种批评和哲学思潮出现，它们不厌其烦地

对安静的等级森严且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攻击。另外一个线索是新尼采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涌现。尼采，通过巴塔耶、布朗肖和克罗索夫斯基的重新解释，直接锻造了福柯、德勒兹和利奥塔等的思想形象。在70年代，以索绪尔和尼采为开端的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阶段。这是理论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被索绪尔和尼采的两组概念所标志：差异，断裂，任意性；以及力，欲望和身体。这两组概念相互援引，左右开弓，向总体性和理性发起了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代性背景和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攻击。陈永国对60年代以来的这两个阶段都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勾勒——事实上，人们对这两个阶段的理论并不陌生。陈永国这本书中最有意义的是对理论的第三个阶段的分析。这第三个阶段，各种理论凭借自己的旨趣和潜能进行了复杂的重组。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再沉浸在纯粹的哲学抽象中，相反，具体的伦理和政治的问题塞满了后结构主义的视野。这个阶段不再构成一个明晰的理论思潮，而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处境的批判。理论在这个时刻处在一种多样性的踌躇状态。

这本书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后结构主义伦理政治进行全面的梳理，陈永国关注的是两个潜在的但是意义非凡的理论线索：一个是马克思到德勒兹到詹姆逊到哈特的线路；一个是索绪尔到德里达到斯皮瓦克的线路。在第一个线路中，德勒兹不是和人们通常所熟悉的与尼采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当然是决定性的），而是和马克思发生了联系。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和德勒兹受到了双重的激活。德勒兹的辖域化/解域化概念，欲望和流动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结合在一起。资本在流动和领土的范畴中得以重新定义：资本的特征正是流动，同时，这种流动是一个解域化、辖域化和再解域化的不停息的过程（这也正好是欲望的运动特征）。这也是一个地理的认知测绘过程。德勒兹式的欲望之流，一旦成为马克思的资本的特殊的内在性，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的诞生。它被哈特和奈格里命名为《帝国》。事实上，在这个“帝国”中，我们看到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完美缝合。而缝合的针线，就

是德勒兹的永不停息的欲望之流。陈永国对此有一个完整的描述——这或许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这本书另一个有意义的阐述是重新探讨了翻译问题。这是围绕本雅明、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展开的另一条理论线索。无论是本雅明还是德里达，翻译都不是一种语义的再现，对本雅明来说，原文之所以需要翻译，是因为它想存活于另一段历史，另一个地方。因此，译文是原文的生命延续，是原文的分娩，但是，译文在“分娩的阵痛中”宣告了原文的死亡。译文并不是将忠实作为对原文的纪念。这种翻译的分娩和存活——德里达重读了本雅明——正是一个“延异”过程。正是经由翻译，语义在时间的延宕和空间的变异中存活，是在时空的越界中存活，而不是原义的单纯复述。延异过程中的越界充满着暴力，这正是文化政治的特征，文化政治正是出没于这个翻译的延异中，出没于这个时空的越界轨迹中。我们看到，翻译，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既是抵制和批判的，也是暴力和征服的，既是自发的充满爱欲的身体性的，也是富于策略性的文化抉择式的。解构主义还推开了诸多的伦理政治大门。在此，每一次决断都是政治性的，但是，有一种特有的反决断的犹豫，德里达赋予这种犹豫一种困境的诗意——或许，犹豫和难以抉择，是生活、政治和伦理的一切奥妙所在。犹豫总是在责任的重压下徘徊。犹豫和责任相互依偎。这本书不厌其烦地探讨了这一点。如果相信这一点，我们会理解德里达闪烁其辞的辩证法则，理解那些词语和词语之间的蜿蜒式的盘旋，理解那些思考本身的诡异、暧昧和复杂性的深渊。这个文本和思考的深渊，不是偶尔为之的两难，而是一个基本的困境。所有的决断都是舍弃。人类及其各种精神生活从来不是一目了然的。在此，犹豫上升到风格的层面：既是一种生活政治的风格，也是一种美学政治的风格。

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正在它的展开过程中。这个过程，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理论对现实的再叙事。看上去，纯粹的理论发明走到了尽头。为此，人们现在开始发表对理论的凭吊，有一部分人在哀悼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的消亡。事实上，对理论的抵制一直是理论发明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人们甚至会说，理论就是在对理论的抵制中存活的。在什么意义上，人们会说理论消亡了？事实上，只要思考没有停止，理论就不会消亡。即便人们直接讨论今天的政治经济现实，仍旧无法脱离理论的框架——理论的视角不仅重写了我们既有的历史，同时还打开了一道道隐蔽的思想窄门。在这本书中，我们显而易见地就能发现，如果不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翻译理论的出现，我们会从翻译这个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政治碰撞吗？如果没有德勒兹的流动哲学，我们会从“帝国”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化吗？同样，如果不是后殖民理论的出现，我们会去发现一种世界银行文学吗？这些理论并不意味着一种独断的真理，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发现、一种新的认知。事实上，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的绝对独断论都必定是知识暴君。既然如此，那么，认知的意义何在？用福柯的话来回答吧：“它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的好奇心，值得我坚持不懈地去实践它……它有权探究在自己的思想中什么是可以通过运用一种陌生的知识而被改变的。”或许，自我认知，自我批判，这就是理论的意义所在。如果是这样去理解理论话语，人们就不会去质问欧洲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现实这样的愚蠢的问题了。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和一种实践能够天衣无缝地结合，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修正的关系。而知识的快乐来源之一正是这种彼此的修正，以及这种修正中的发现和建立在这种发现之上的自我修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表达了理论写作中的快感。这种快感被思考的强度所强化。理论因此在这里变得非常密集，一个线索连着一个线索，一个焦点接着一个焦点，就如同高原上的不停息的长途奔波。这种思考的奔波，同人们常见的一般性的浮光掠影的理论介绍毫无关系。相反，它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地穿越于各种理论之中，这些理论被作者所贯穿起来，它们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关联。这种理论上的密切关联迫使我们思考，而这本书的作者在穿越这些理论，迫使我们思考的同时，却也提醒我们，对理论的穿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论的逃逸。

目 录

Contents

序 (汪民安)	3
第 1 章 解构的缘起与话语	1
第 2 章 互文性与历史叙事	21
第 3 章 德里达: 作为批评策略的解构主义	63
第 4 章 德勒兹: 游牧思想与解域化流动	109
第 5 章 詹姆逊: 现代性与资本的现代叙事	141
第 6 章 文化翻译: 语言的逃逸政治	175
第 7 章 斯皮瓦克: 作为解殖策略的翻译	213
第 8 章 从世界文学到世界银行文学	231

第 1 章

解构的缘起与话语

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引起了文学批评主旨的转变：即从内容到形式、从意义到结构的转变。结果，个别文化符号的意义，如文学文本的意义，被认为只在与其它文化符号的对立中产生，只存在于形式之中和指意系统内部符号的相对位置上。结构主义批评家的主要关注点聚焦于作为文本基本构成因素的“功能”，设计出关于文学样式的一种成熟的分类学，从而突出作为所有个别文本之共享的主语码的基础“语法”。把叙事的“深层结构”孤立出来的需要使批评家把注意力从具体的、特殊的和历史的表层现象移开。结构主义批评家不是讲述所分析的个别文化文本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把其意义定义为交际游戏中各个结构嬉戏的结果。因此，创造性读者或“抄写员”取代了话语中作者的位置，并成为给予并确定意义的人。

——苏珊娜·奥尼加，《结构主义与叙事诗学》

从广义上说，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一场知识运动；而从狭义上说，结构主义则是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分析对象或研究客体是广义上的人类文化，其兴趣焦点是研究限定性结构，认为个体现象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而只能在一个系统结构内部与其他因素构成某种关系时才具有意义。更确切地说，结构主义是把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人曾把结构主义的源头追溯至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1778—1857)和人类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又译涂尔干, 1858—1917)，但就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重要影响而言，其真正的理论源头应该是操法语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索绪尔于1906—1911年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语言学(梵语和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1913年去世后，他的一系列开拓性讲座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1] 一般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促成了现代思想的一场革命，可以与科学史上伽利略的天体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同日而语。在索绪尔之前，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并不存在。当时的语文学家们对世界上各种语言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目的是发现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关系，探讨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变化，而且往往局限于一种语言内部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英文推荐版本：*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é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Riedlinger;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关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综述性或研究性著作，推荐阅读 Jonathan Cull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1986); David Holdcroft's *Saussure: Signs, System, and Arbitrariness* (1991), and Fredric Jameson's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1972).

的词源或语音变化，因此，是一种历时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语言的本质，认为语言与世界处于一种模仿的关系之中：语言是对世界结构的模仿，因此，没有自己的结构。

索绪尔在不抛弃历时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创了一种共时研究方法，即对某一特定时段内的语言进行研究，强调这种语言在这个时段内的功能，而非某一特定因素的历史发展。他认为语言并不是对世界结构的模仿；语言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和高度系统化了的规则。语言就是通过这个内在结构和这些规则发生作用的。换言之，语言交流所依据的语法是一套复杂的规则系统——包括语音、词法、句法和语义。个体说话者的实际言语和书写都受这个规则系统的制约。索绪尔把个体的语言活动叫做言语，而把制约这种言语活动的规则叫做语言。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言语的个案分析找出语言的规则（律），他们的研究客体应该是在所有语言现象背后运作的“语法”，这个“语法”可以用来描写一种特定语言的结构，能为那种语言提供一个结构模式。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包括爱弥尔·本维尼斯特、列奥纳多·布鲁姆菲尔德和诺姆·乔姆斯基，都深受索绪尔的影响，试图通过对语言规则的研究建构一个结构模式，即能够描写人类普遍语言能力的一种“语法”。

那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普遍语法呢？索绪尔之前的语文学家们认为，一个词是一个符号，代表着这个词所指的物，因此，词与物是相等的关系。索绪尔则认为，词显然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接触的物。所有语言都是由最小的基本单位构成的，他称这些基本单位为“素”：如音素、词素、义素等。语言学家首先要识别和理解本族语和其他语言中的这些基本单位，然后通过比较和对比研究发现这些“素”或语言学范畴的功能和意义。索绪尔发现，语言的特性或意义取决于“素”与“素”之间（或之内）的差异；语言是由语言符号（而非词）构成的；而语言符号又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即用来标记声音或书写的符号，另一个是所指，即能指所指涉的概念（而不是指涉物）。声音（或文字）借助能指把概念形象从说话者（作者）传达给听者（读者/接受者），后者继而把这种概

念形象转化为精神概念。索绪尔坚持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词)与所指(词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拉丁语的 arbor, 德语的 Baum, 法语的 arbre, 英语的 tree, 汉语的“树”, 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概念, 但这些词作为能指并不表明任何自然规律或结构, 它们之所以被特定语言(拉丁语、德语等)的使用者所接受, 是由历史上的流行用法和审查制度(约定俗成的真正含义)所使然。而能指与所指之间, 语言符号与指涉物之间, 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实际上是以康德的自然观为基础的。康德认为自然除非通过人类思想和语言的中介, 否则是不可认识的。但索绪尔修正了康德的不可知论, 不但认为词和语言可能拥有某一自然的本原, 而且认为语言不是纯粹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 语言先于一切思想而存在,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个先验范畴, 是我们据以构造世界的原始符号系统。语言结构作为一个符号系统, 和时装、体育、饮食习惯等社会行为一样, 都是通过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从方法论上说, 这种符号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革命性就在于: (1) 把作为一个形式系统的语言明确规定为研究客体; (2) 限定了语言形式系统的基本因素或最小单位; (3) 设定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系统的, 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 最后, (4) 把语言看做形式而非本质, 强调语言的共时层面, 但同时并不否认历史诠释的逻辑生成。^[2]

把语言看做结构, 这是人类的一个发明, 是语言学家建构的一个探索模式, 是人们借以探讨社会历史现象的一个抽象的、虚构的模式, 结构语言学也因此成为 20 世纪探讨人类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说, 对基础结构的探讨主要依据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 而这两个原则从本质上又离不开二元对立的关系。比如, 结构主义人类学就用二元对立来描写自然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的他者是自然, 自然的他者是文化。但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严格说来并不就是索绪尔的差异系统。对索绪尔

[2] 相关内容参见: F. de Ferdinand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66); J. Ly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1); N.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9); W. J. Frawley (ed.), *Interan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ed., 4 vols., 2003).

来说,语言中只有差异。在用结构语言学模式进行分析时,分析者必须依据差异原则,满足一些必要的充足条件:这种分析必须由基本术语构成;这些术语必须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必须构成一个自律的独立于显在意识层面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语言的、社会的、行为的,是对时间上各不相关的现象加以组织的一个系统。简言之,这是把文化符号的规定性功能加以改造的一个总体化阐释系统。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通过使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在人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方法论革命。^[3]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神话拥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正如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无意识拥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每一个单个神话就好比个体的言语,而制约所有这些单个神话的整体结构就是神话语言,或限定神话功能和意义的规则。与索绪尔一样,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无数神话进行研究和解读后,找出了所有神话共有的反复出现的最小单位,他称之为神话素。与音素不同的是,神话素超越文化和时代的局限,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中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而与音素相同的是,它们在神话的整体结构内部与其他神话素构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如爱与恨),神话的意义就产生于这种关系之中。俄国语言学家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弗拉基米尔·普洛普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模式,在所有俄国民间、童话故事找出了31个固定因素,他称之为“功能”,故事的意义就蕴涵在这些“功能”的差异中。^[4]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把索绪尔的结构模式推向极致,认为一切语言都是基于二元对立关系的自身封闭系统。这种二元对立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单个音素之内(如S/Z

[3] Lévi-Strauss, Claude,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8. 特别推荐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名文:“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4] 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发表于1928年;虽然是民俗学(folkloristics)和形态学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并极大地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译成其他文字。相关文献参见:Propp, Vladimir, *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lore*, Anatoly Liberman (e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中的 /s/ 与 /z/)。^[5] 结构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文本中的二元对立, 指出它们的相互关系, 破解文本的语码, 并据此解释文本的意义。就文学的整体结构而言, 单个文本(如普洛普的单个神话一样)并不构成意义, 而只是相当于言语信息, 只有将其与整个系统中的其他语码、符号或对立因素关联起来, 意义才能得以阐释或诠释。

从这些结构主义者对索绪尔结构模式的应用和发展来看, 虽然应用原则不尽相同, 但其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都把语言作为意义生成的基本工具, 而语言又构成了其自身受规则制约的指意系统。在他们看来, 一切社会实践和文化习俗都是受规则或符码制约的。对现实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这些规则或符码, 因为现实的意义就存在于这些规则或符码之中, 存在于由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之中。不管采用什么出新的方法, 结构主义者都坚信意义是可以阐释和诠释的, 即是说, 意义是存在的。这与启蒙运动或理性时代以来流行的现代思维范式并无本质的区别: 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来说, 理性是人生的最佳向导, 科学是人类的最大希望, 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而真理(和客观现实)终将被发现。所有这一切都起因于对自我的确认, 起因于由“我思”而确认的“我在”。这就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那种确定性。

[5]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Paris: Seuil, 1970. 关于巴特理论的总体研究和综述, 见 Jonathan Culler, *Roland Barthes* (1983); Louis-Jean Calvet, *Roland Barthes* (1995).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S/Z* 是巴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影响巨大; 但与结构语言学关系最密切的、应用索绪尔符号语言学进行叙事分析的著作则是他的 *The Semiotic Challen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8)。在 *S/Z* 中, 巴特区别了两种主要文学: 一种是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 如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 另一种是 20 世纪的实验主义文学, 如俄国的未来主义、英美的现代主义和法国的新小说。现实主义文学是“可读性文本”, 因为它是透明的, 读者可以即刻获得其中的意义; 实验主义文学是“可写性文本”, 因为它要求读者的积极参与, 否则便不能获得文本的意义。

二

作为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雅克·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对两千多年来盘踞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拨和颠覆。^[6]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人的构造或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始终占主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中心”和“在场”为基础的，因此抑制了能指的自由嬉戏，使能指屈从于某一超系统的“超验所指”：即概念或哲学据以确立的一个外在指涉物。德里达断言，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之上的：即寻找这个“超验所指”。从定义上说，这个超验所指也是超验主体，是意义的权威，意义的历史，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为表征的历史。任何诉诸于指涉概念、试图抑制能指的无限嬉戏的企图都必然要设定一个超验所指，它不通过话语的中介就能呈现于意识层面；它是本原之本原，为从符号到符号的指涉提供终极意义和可靠的终点；它的意义并非产生于差异或关系，而直接产生于自身，直接提供意义中心。而这些意义中心本身也就是超验所指，如上帝、理性、本原、存在、本质、真理、博爱、自我，以及逻各斯等。

渴望得到或占据这样一个中心就是相信终极现实和终极真理的存在，就是把人的思想和行动根植于一个系统的“此在”，这个“此在”保证和固定语言的意义，而本身又超越任何审查或挑战。这样一个中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另一个中心形成概念上的对立，如上帝/人，理性/

[6] 一般认为，这场思想革命开始于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的题为“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的论文，接着在1967年连续发表三部重要著作：《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这是德里达的一部纲领性文献，表明他的主要关注点是言语与书写，以及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的互动，批判了他们关于言语优越于文字的观点；《言语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批判了胡塞尔及其关于两种意义模式的区分(象征与表达)；《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书中收集了他于1959年到1967年写的论文，所论的重要人物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托、巴塔耶、弗洛伊德和福柯。

非理性，真理／谎言，语音／文字等。但这种对立呈现的并不是平等的二元性，而是体现了等级差别，因为西方形而上学以及语言的习惯表达总是赋予前者以特权和优先性。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这样的对立中：男／女，人／动物，灵／肉，好／坏，善／恶等。因此，这种二元对立本质上是“等级对立”：前者优越于后者，后者对前者而言是“增补”或“多余”。德里达把这种“等级对立”统称为“语音中心主义”（针对索绪尔把语音凌驾于文字之上而言）。而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神学”）的自我认同传统又是以在场为主导价值的：不管它认知的对象多么复杂，不管其学说原理采取哪种倾向，不管其阐述的内容是否特殊，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都离不开这个在场的价值，因此，德里达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通过颠覆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即把在场和缺场的顺序颠倒过来，德里达不但从理论上推翻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依据，而且确立了一套全新的阅读策略，解放了迄今受西方思想束缚的种种新的阐释方法。^[7]

但是，严格说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其说是解剖了西方思想史上等级化了的二元对立，毋宁说是展示了这种二元运作，并在展示的过程中对西方思想界的大师们进行了谱系学式的检验。作为结构主义的掘墓人，他首先检验的当然是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字学》中，德里达承认索绪尔通过抽空所指与其表达方式的内容而打

[7] 除本章第三节涉及到的阐释方法外，受德里达阐释方法影响最大的批评思潮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关女性主义的重要文献见：Diane Elam, *Feminism and Deconstruction: Ms en Abyme* (1994); Nancy J. Holland (ed.),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Jacques Derrida* (1997); and Ellen K. Feder, Mary C. Rawlinson, and Emily Zakin (ed.), *Derrida and Feminism: Recasting the Question of Woman* (1997).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见：Michael Ryan,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1982); Bill Martin, *Humanism and Its Aftermath: The Shared Fate of Deconstruction and Politics* (1995); Michael Sprinkler (ed.), *Ghostly Demarcations: A Symposium on Jacques Derrida's Specters of Marx* (1999).